



在泸定桥畔“重返”绝地突围的战斗岁月



▲2026年5月从泸定桥东桥头拍摄的泸定桥(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在泸定桥旁的“渡河纪”全感互动空间，游客借助VR设备体验“飞夺泸定桥”。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走进”那段峥嵘岁月，与红军战士们并肩作战吗？在四川泸定县的泸定桥旁，一场沉浸式体验可以带你穿越时空身临其境，感受当年革命先辈“向死而生”的浴血战斗。

这里是以“飞夺泸定桥”为主题的全感互动空间“渡河纪”，在观影基础上，整合VR大空间、多感官模拟和

虚实配准等技术，让这段历史变得“可感可触”。

1935年5月29日，中央红军面对汹涌的大渡河以及被抽掉木板只剩铁索的泸定桥，冒着枪林弹雨由桥头匍匐过江，夺下泸定桥，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

“渡河纪”位于泸定桥东桥头的泸定桥广场上，整个空间以铁索为设计灵感，集全感体验、互动场景、红色



研学于一体。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戴上头显设备，手持道具，瞬间“置身”1935年的大渡河畔。脚下水流湍急，两岸崇山峻岭，悬崖峭壁，稍不留神还有“坠落”风险。

整场情景体验由“安顺场渡河”“海拉尔行军”“菩萨岗血战”“什月坪急电”“飞夺泸定桥”五个篇章组成，还原1935年5月27日起，中央红军由

安顺场出发奔袭泸定桥的全过程。

“剧中主人公的原型是一名叫‘云贵川’的少年，在红军长征途中加入队伍，一路跟随红军并参与战斗。”“渡河纪”导演曲泳帆介绍，全剧透过这位少年的视角，讲述红军战士间、红军与群众间的深厚情谊。

制作团队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助下，查阅史料、重走长征路，280余人耗时7个月完成建模、动画特效等制作。“前沿技术帮我们最大程度还原了历史质感。”产品经理周佳禹介绍，制作团队对泸定桥、大渡河两岸地形等细节进行了1:1高精度建模，光学动捕技术和AI算法保证了角色动画表演的流畅性和真实感。全程50多个体感反馈设计经过反复微调和测试，使效果服务于内容和剧情。

项目落成一年，已有4.8万余人前来体验，近30分钟的经历令人难以忘怀。来自北京的刘先生一家三口告诉记者：“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故事从小就耳熟能详，但这是第一次如此真实地感受到当年红军的不易。”

如今，“渡河纪”已与泸定桥景区、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深度联动，构建起丰富立体的红色旅游产品体系，让红色精神在传承中更加生动鲜活。

（据新华社社）

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

——走进“平型关大战突击连”

又一批新兵来到了距平型关千里之外的“平型关大战突击连”。

“战旗最动人的模样，绝不是挂在荣誉室的墙上，而是高高飘扬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荣誉室里，连队政治指导员栗新朝对新兵们说。

他身后，正是“平型关大战突击连”的战旗。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消息很快传遍大江南北——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那一役，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当年的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2营5连率先冲进了敌群，老连长曾贤生的大刀砍到卷刃，排长们的枪托砸得断裂，班长们的身上分不清是敌人还是自己的血。”“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连长阎伟说，“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这面旗帜，战斗过后由115师343旅授予连队。经此一战，全连只剩下30多人，牺牲者平均年龄不过20出头。

2015年9月3日，在新中国首次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为主题举行的阅兵中，“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英模部队方队光荣接受了祖国和人民检阅。

2019年10月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包括“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在内的100面荣誉战旗气势如虹，见证了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奋进征程。

如今，擎旗向前的，是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多数出生在21世纪，共同的名字是“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步九连”。

过往的荣誉带给九连自信，自信的九连官兵书写新的荣誉。

“当年的突击，是高举着大刀冲锋陷阵；今天的突击，则是要在‘人装合一’的基础上加快提高打赢能力。”站在荣誉室里一把满是暗红色锈迹的大刀前，阎伟说。

随着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大幕拉开，九连开启了由摩托化步兵向“合成铁拳”的蜕变重塑。这场驾驭新型装甲步战车的“突击”，从最初摸

底考核中射击、通信、驾驶三大专业及格率不足60%，到连队专业人员考核优良率100%，用时不到3年。

“一车注意，正前方‘敌’坦克，反坦克导弹，摧毁！”

3秒之内，导弹没人漫天风沙。

在恶劣天气影响下，导弹开始偏离目标。上士王振民立刻进行修正，导弹最终摧毁目标。

这是发生在蒙古国东戈壁省的一幕。连队整建制出国参加中蒙“草原伙伴-2024”陆军联合训练，探索出风沙条件下某装备新战法。

仅2024年一年，连队就参加了3场实兵演习、3场比武考核，被陆军表彰为“军事训练先进单位”，54名官兵立功受奖。

“胜利不会向我们走来，我们必须自己走向胜利。”阎伟说，各类比武前，九连会组织尖子队和补差队加练。

“每个人的能力有参差，只有人人都想拿第一，九连才能是第一。”负责带教的比武尖子王峰说。

每逢有人职务晋升，九连都要集体开一次“提职补短会”，大家直言短

处，帮助战友更好地履新。第46任政治指导员姜丰回忆：“我调离之前，他们让我别再那么‘唠叨’了，还送了我一本纪念相册。”

相册里，有一张特殊的“大头照”。“这是刘鑫的照片，刚入伍的时候他性格特别内向，看人都是低着头。”姜丰说。

经过两年的淬炼，刘鑫凭借全旅比武第一的成绩立下三等功。

两年，可以改变很多——刘鑫的两年，是从“曾经想退伍”到“坚定要留队”；王振民的两年，是从业务尖子到能力全面的“六边形战士”；阎伟的两年，是从聚焦实兵对抗到抓“有人+无人”训练……

从2025年到2027年，也只有两年。到实现建军一百周年奋斗目标那时，九连又会度过怎样的两年？

“下连仪式上，每名九连新兵都收到了一张带有荣誉编号的战斗宣言书。”栗新朝说。

宣言书中空白的部分，将由每名新兵来书写。

（据新华社社）

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份铅印军报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军事史学家一致认为：1930年7月29日创刊并已发现实物的《红军日报》，是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份铅印军报。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在彭德怀、滕代远等将领指挥下，攻克湖南省会长沙，接收了国民党长沙国民日报馆的印刷厂，利用其设备、纸张、排版技术创办了大开4版的《红军日报》，设有“社论”“特讯”“新闻”“文艺”等专栏、专版，为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传播红军的革命主张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5年7月，在福建漳平一座土地庙里，发现一张粘在墙壁上的《浪花》创刊号，虽已污迹斑驳、残缺破损，但许多铅印的字迹依然清晰。历经五十余载，它已与土墙牢牢黏合在一起，无法揭下，工作人员就把它连同墙体一同切割下来，运到古田会议纪念馆收藏。后经专家、学者确认，这张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办，1929年7月27日在闽西创刊的《浪花》，早于《红军日报》一年多，是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份铅印军报。

1929年，蒋介石调集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兵力围堵红四军。红四军在党代表毛泽东、军长朱德率领下，机智灵活地艰苦转战，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并攻占了福建长汀县。当时，县城有一家地下党员毛钟鸣及其兄长毛焕章创办的毛铭新印刷所，多年来不但为我党秘密印刷红色宣传品、各类文件等，还为红军搜集、传递情报，掩护、转送革命同志和军需物资。

红四军进驻长汀后，毛泽东来到印刷所，看到毛焕章刚从广东购进的活版印刷设备，高兴地说：“革命宣传好比是向敌人发射的精神炮弹，印刷所好比是制造这种炮弹的兵工厂。”

在红四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强调：“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提出要‘尽可能的公开发行人日报及其他地方性党报’，所以必须把舆论工作当作军队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红四军决定由政治部主任李任予负责，创办军报《浪花》，印刷任务则交给了毛铭新印刷所。毛钟鸣采用质地优良、绵韧薄柔的“玉扣纸”印刷报纸，四开两版的《浪花》创刊号付印当天，红军政治部就派人在长汀的工厂学校、商号店铺散发，还到附近县城繁华街道、人员聚集的地方秘密张贴，吸引各界群众详读、阅览，引起广泛反响。

《浪花》创刊号在“发刊词”中开明宗义地阐明了办报宗旨：“唤起被压迫阶级和弱者，去踏死那些非作歹的败类——国民党反动派”“效力于它的主人——被压迫阶级”等。

《短评》专栏以“最近时局鸟瞰”为主要内容，列举大量事实，分析、戳穿了汪精卫、冯玉祥、张发奎等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重重矛盾，揭露了蒋介石领导中国只是表象，军阀混战的危机一触即发，并畅快淋漓地抨击了反动军阀不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迫害爱国人士，土豪劣绅横行霸道、压榨百姓的罪恶行径。

《特讯》栏目以漫画“灯光照耀”开篇，惟妙惟肖地勾勒出国民党匪军在光照下惊恐万状、贫苦百姓欢欣鼓舞的画面，比喻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像一盏明灯，给人民带来了光明，反动派却惶惶不可终日。《特讯》还详细报道了红军攻克长汀、歼灭军阀郭凤鸣、陈国辉部队的战绩和闽西红色根据地的创建及发展，各地举行工农暴动、组织工会、农会、赤卫队等消息。

创刊号还刊载了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制定的条例和分田标准等土地革命政策，号召劳苦大众行动起来，开展武装斗争，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封建剥削制度。

如今，《浪花》创刊号已被确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这张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份铅印军报，内容丰富、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记录了红军英勇杀敌的胜利成果和革命群众支援人民军队的高涨热情，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在配合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创建红色根据地等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据《天津日报》）

口头为语 书面为文

1949年4月初，叶圣陶出任华北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前身）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要承担新中国教科书研究、编写、编辑、出版与发行等职能，下设国文、史地、自然三组，其中国文组负责编写或改编教科书，制定新的课程标准。

8月，叶圣陶主持草拟《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时，第一次使用“语文”作为学科名称。

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兴新学，开始从西方全面引进学校课程和教材，但“国文”一科，仍传授“读经讲经”和历代古文。五四运动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冲击。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小学改为“国语”，教材选用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中学仍设“国文”课，以文言文为主，却也增加了白话文的比重。上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曾提出“语文”概念，尝试新编语文教材，然而，由于日本入侵中国，这一计划未能得到实施。

1950年6月，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出版了全国统一的以“语文”命名的教材。叶圣陶在《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大意”中指出：“说出来的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叶圣陶对此还专门解释说：“什么叫语文？语文就是语言，就是平常说的话。嘴里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简而言之，语文就是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简称。这一对“语文”学科的命名和解说，得到教育界的普遍认同。从此，“语文”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成为中小学母语课程的通用名称被推向全国。

1964年2月1日，叶圣陶在回复浙江乐清中学语文教师滕万林的信中，又较为详尽地解释了“语文”一词的由来和含义：“‘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此前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原意为近，唯‘文’字之含义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本中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第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原意合矣。”叶圣陶对“语文”一词的进一步解释、阐述，精练概括，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所接受并沿用至今。

叶圣陶不仅首先提出了“语文”一词，后来还为《语文》教材题写了“语文”二字，厚重饱满，儒雅端正，成为一代代学子永远的记忆。

（据《北京青年报》）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王景洲烈士使用的铁路煤油信号灯。（资料照片）

70多年前，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承担铁道运输保障任务的中国铁路工人，担负起光荣的军事运输任务，王景洲正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入朝前，王景洲是磐石车站的一名车号员。因踏实肯干、兢兢业业，

以青春之躯护运输畅通

——文物背后的抗美援朝故事

在吉林省博物院的馆藏文物中，一盏老式手提铁路煤油信号灯引人注目。这是志愿军二级英雄王景洲生前使用过的执勤工具。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铁路工人和铁道兵一起冒着枪林弹雨抢通铁路，以血肉之躯筑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将物资源源不断送往前线。

他多次获评先进工作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加入第一批中国铁路职工志愿援朝大队赴朝，被分配至新成川车站任车号员。

新成川车站是抗美援朝铁路运输线上的关键枢纽，过往车次密集、保障任务艰巨，长期处于敌机重点轰炸范围之内。1951年2月8日，敌军战机空袭该站，投下数十枚定时炸弹。敌机飞离后天色完全暗下，未爆的定时炸弹在站内接二连三爆炸，泥土、碎石、枕木碎块与弹片在爆炸的浓烟中四处飞溅，车站沿线两侧的房屋被爆炸引发的大火吞噬，局势万分危急。按照运输调度计划，当夜站内尚有一列伤员列车需要进站避让，两列满载前线急需物资的重要列车必须正点开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王景洲在车站九道线路上排查出两枚重约二三十公斤的定时炸弹。他不顾生命危险，先后将两枚炸弹扛至站外空旷地带处置，成功避免重大损失。

在距离新成川车站不远的沸流江

上，有一座100多米长的铁路大桥。敌机经常对这座大桥进行轰炸，妄图切断我军运输线。王景洲同战友们随炸随修，保障着运输畅通。

1951年3月1日，敌机再次对新沸流江大桥发动轰炸。2日清晨，一台机车推送满载弹药的列车驶过大桥，准备进入距离大桥约300米处的山洞隐蔽，从大桥到洞口是一段上坡道。由于前一天大桥受到轰炸、刚完成应急抢修的线路基础不稳，列车中部数辆弹药车发生脱轨，导致全列无法继续行进，必须紧急处置。根据过往经验，黎明前后正是敌机空袭最频繁的时段。因此，大家先将靠近机车一端未脱线的车辆拉回车站另行隐蔽，再将桥上剩余的9辆弹药车分解，计划用绳索逐辆拉进山洞避险。王景洲与值班员岳永昌率先请战，主动承担提钩、摘解风管的关键任务。

就在王景洲和战友们合力牵拉第八辆弹药车时，敌机突然窜至上空，随即展开轰炸与低空扫射。众人受突

发情况影响发力过猛，绳索被直接拉断，正在坡道上移动的弹药车顺势向后溜滑，速度越来越快。一旦溜行的弹药车与后方车辆相撞，必将引发剧烈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危急关头，王景洲与岳永昌立刻抄起撬棍试图卡阻车轮，接连几次都没能成功。眼看弹药车即将高速相撞，王景洲毅然将自己的身躯压在撬棍之下，用全身力量死死抵住下滑的车辆，最终成功挡住了溜行的弹药车。整列弹药车和沸流江大桥都保住了，22岁的王景洲却永远将生命定格在沸流江畔。

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党委根据王景洲生前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3年11月，志愿军政治部给王景洲追记一等功，授予二级英雄的光荣称号。为永久纪念这位从磐石大地走出的英雄，其家乡吉林省磐石市专门为他修建了烈士纪念碑，并设立王景洲烈士纪念馆，供后人瞻仰缅怀。（据《中国国防报》）